

文物资料丛刊

7

文物出版社

文物资料丛刊

7

1984年

文物资料丛刊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7

文物出版社

北京

文物资料丛刊

(7)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3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11.5 插页4

统一书号: 7068·946 定价: 2.00元

目 录

- 巴蜀铜器纹饰图录……………四川省博物馆 刘 瑛 (1)
- 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四川省博物馆 刘 瑛 (13)
- 四川越西华阳村发现蜀文物……………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越西县文化馆 (24)
- 涪陵考古新发现与古代“巴国”历史的一些问题……………王家祐 刘璧石 (28)
- 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熊传新 (30)
-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管会 茂汶县文化馆 (34)
- 吉林突泉县刘家街石棺墓……………张中澍 马大东 (56)
- 西昌附近的古代火葬墓……………黄承宗 (61)
- 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承德地区文化局 滦平县文物管理所 (67)
- 准格尔旗大路公社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汪宇平 (75)
- 新民高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1976年发掘简报……………
新民县文化馆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80)
- 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许玉林 许明纲 (92)
- 库伦、奈曼两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与内涵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李殿福 (98)
- 科尔沁右翼中旗呼林河沿岸原始文化遗存……………李甸甫 朱声显 (115)
- 内蒙古白音尔灯清代荣宪公主墓……………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项春松 (122)
- 清固龙雍穆长公主墓……………张柏忠 (127)
- 辽阳市公安堡村彭春墓……………辽阳市文物保管组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134)
- 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138)
- 记丹阳大泊发现的唐宋砖志……………镇江市博物馆 刘 兴 刘建国 (147)
- 西京洛阳漏泽园墓砖……………贺官保 (151)
- 记广元宋墓腰坑出土文物……………魏达议 (157)
- 辽宁开原老城镇出土的元代铜器和铁器……………冯永谦 (163)
- 文博简讯:
- 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一件铜甗…………… (33)
- 韶关西河发现宋代铸钱遗址…………… (66)
- 战国时期的铭文铜戈…………… (79)
- 颍上出土隋代半陶半瓷瓶…………… (126)
- 丰宁县凤山镇发现战国早期墓葬…………… (163)
- 四川犍为县发现巴蜀墓…………… (169)
- 哲盟科左后旗苏鲁吐辽墓…………… (172)
- 辽阳发现明代佛朗机铜銃…………… (173)
- 北京门头沟区发现的一处金代窖藏…………… (174)
- 扬州出土的元代铜权…………… (176)

巴蜀铜器纹饰图录

四川省博物馆 刘 瑛

四川地区的巴蜀铜器，上起商周，下至战国，大多数是解放后省内各地出土的，少数是收集的。铜器上的纹饰，表现了巴蜀文化的特色，是研究古代巴蜀历史及其文化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纹饰内容有蟠龙纹、兽面纹、蚕纹等十几种，而以虎纹、螭纹为最多。纹饰布局，有布满全器的，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表现的，多采用对称、单独、二方连续等方式。讲究运用传统的“S”纹、小钩子等作为图案单位的基本骨架，并广泛运用等距、等分、同心、同形等手法，加强纹饰的节奏感。至于纹饰作法，有立雕、浮雕、平雕、浅刻、镶嵌等，集多种于一器，较为普遍。如彭县竹瓦街出土的几件铜罍，盖上有立雕蟠龙，器体上有夔龙纹浮雕，四侧又使用脊棱装饰，则是较为典型的一例。战国晚期的巴蜀铜器，无论在器型或纹饰上，都在继承商周风格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器型较多，纹饰除范铸外，出现了嵌错红铜（如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嵌错金、银丝（如广元出土的铜壶），反映了巴蜀青铜工艺的新水平。

图录中的器物形制、纹饰，有不少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相似、相同，有些铭文的字体风格也很相近，这说明了当时的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夔龙兽面纹罍（一）^{①②}

1959年彭县竹瓦街出土。通高50、身高

34、口径17、底径19厘米。

盖饰立体昂首蟠龙，龙背有棱脊。肩部饰浮雕大夔龙，身、鼻卷曲，两两相对，口下有小夔纹，尾后有鸟纹。肩两侧有一对兽首衔环耳，珥下垂成钩形。两耳间近颈部有羊头装饰。肩腹之间有宽弦带纹一道，分割上下两部分纹饰。腹饰兽面纹二对，大口巨目，下腹一侧有兽首鬃。圈足部平雕两对夔纹。通身以细云雷纹填地衬托主体纹饰（图版壹：3，图一：1）。

这种造型纹饰与1973年辽宁喀左县出土的蟠龙兽面纹罍相同^③，其中卷体夔龙与1966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西壕周墓出土的夔纹簋^④亦相同。是西周纹饰的共同特点。

夔龙兽面纹罍（二）

1959年彭县竹瓦街出土。通高48、口径17、底径1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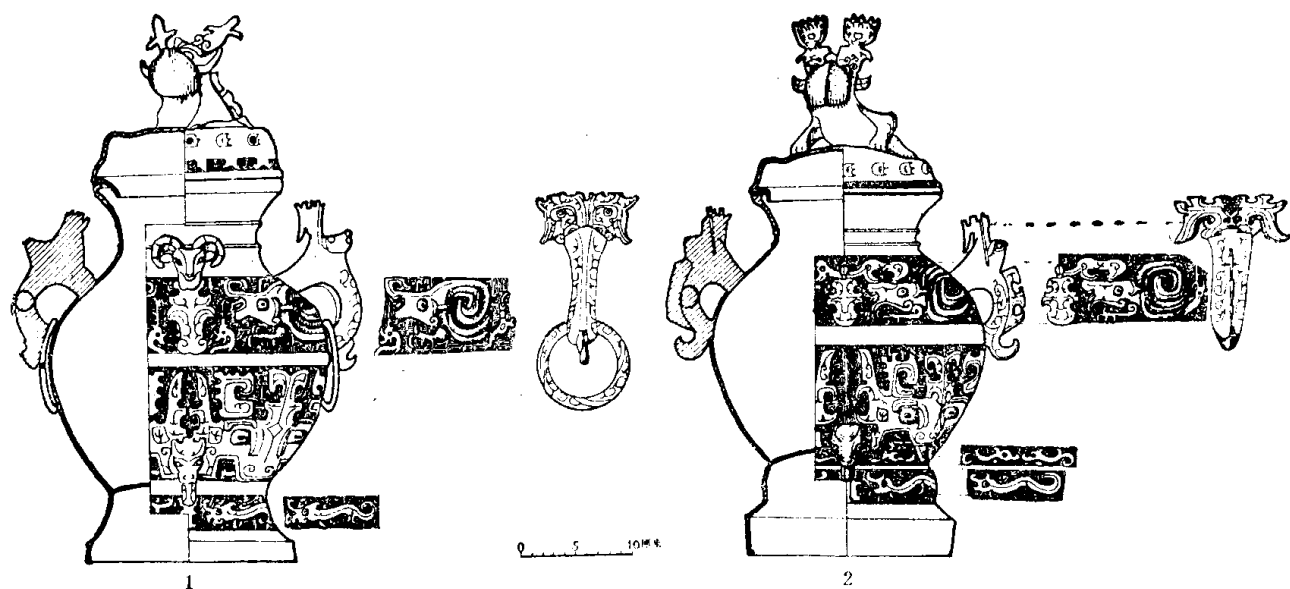
与前器比较，有几处不同：一、盖上龙角成扇形；二、颈稍短，肩部大夔龙口下无小夔龙；三、兽首耳无环，高圈足（图一：2）。

卷角兽面纹罍^⑤

1980年彭县竹瓦街出土。通高59.1、身高49.6、口径22.8、底径24厘米。

整个器身从盖纽至圈足，四侧有立棱脊，并直贯兽首耳。

精美而多变的纹饰也独特少见，以卷角兽面纹和蚕纹饰盖面，蟠龙和夔纹饰其肩，卷鼻大夔龙以饰其腹，以牛纹饰圈足，通体以细云雷纹填地。盖上兽面的角、卷曲而逐



图一 1.夔龙兽面纹罍 2.夔龙兽面纹罍

渐直立于器面上，由于运用浅浮雕（兽面）过渡到高浮雕（卷角），使整个兽面纹浑然一体，别开生面（图版壹：1，图二：2）。

夔龙纹罍^⑤

出土时间地点同前。通高69、身高49、口径22、底径23.6厘米。

形制与前器相同。盖面则用夔龙饰之，与腹部的卷鼻夔龙形象相像（图版壹：2，图二：1）。

牛兽纹罍

出土时间地点同前，通高78、身高58、口径26.8、底径26厘米。

此器高盖宽肩，纹饰很有特色：盖顶中心有一蟠龙纹，头部凸起，身躯盘曲。盖沿有四个兽面纹，相互毗连。肩耳是双身共一牛首（图版壹：4，图二：5）。

夔龙兽面牛纹罍

出土时间地点同前。通高44、身高33、口径16.8、底径17厘米。

造型、纹饰与1959年彭县出土的相同。但盖纽作圆柱形。盖面浅浮雕二对相向牛纹（图二：4）。

蟠螭纹鼎

1952年成都羊子山出土。通高50、口径

50厘米。

鼎腹上部有一条凸出的弦纹，上饰卷草纹。鼎的口颈部、腹中部及两耳的外侧铸有蟠螭纹，腹中部的一条为最宽。都以三角雷纹（图三：1）、小米点和大圆点组成图案形象（图版贰：3，图二：3）。

蟠螭纹炉

1952年成都羊子山出土。高10.5、口径37.6、炉内深6厘米。

腹部内、外都铸精美的蟠螭纹。腹内纹饰多用刻划符号（图三：2、3）。腹外文饰分上、下两条带纹，纹饰内容相同，以一个单独的蟠螭纹样为基本“节拍”进行反复，连续排列一周。全用带小钩形（图三：4）的单线刻划形象，风格独特、优美（图四，图六：2）。

蟠螭纹奩形器^⑥

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通高10.2、口径11.6厘米。

盖面刻有二圈蟠螭纹，外圈五组，内圈二组。形似互相纠缠的蛇形图案（图五，图六：5）。

符号纹盃^⑦

1965年百花潭出土。高14、口径9.2厘



图二 1.夔龙纹罍 2.卷角兽面纹罍 3.蟠螭纹鼎 4.夔龙兽面牛纹罍
5.牛兽纹罍 6.蟠螭垂叶纹提梁壶



图三 巴蜀铜器上的符号

米。

这是一件有三个符号的盃。盖面上有一圈较宽的纹饰，其中有两个符号纹（图三：6、7）相对排列，正好平分圆周。纹饰内圈与盖纽之间另有一符号纹（图三：8）。

纹饰以米点和大小、粗细、方圆不同的小钩形（图三：9）组成密集的带纹（图六：4）。

蟠螭垂叶纹提梁壶

1976年绵竹出土。通高38厘米。

与羊子山85号墓出土的造型相同。盖有环纽。颈、腹各施条带式星点蟠螭纹三层，以环套式构图组合（图三：5）。在第三层螭纹后颈腹下，以钩连云纹组成垂叶式作上下局部的结尾装饰。盖面为几何纹，壶两侧套以环链，每个环链上嵌有联珠纹为装饰（图二：6，图七）。

鸟纹铜钺

1952年羊子山88号墓出土。通高34.5、口径10、底径10.3厘米。

造型呈四方体形，有盖。每一方的纹饰相同，盖、器身、圈足上都有宽边框。均以小方形鸟纹作排列装饰。从纹饰的整个构图来看，这些鸟纹基本上分为小方形鸟纹和对称鸟纹。小方形鸟纹在蕉叶形内作斜方排列，在盖上和圈足上则作横排。对称鸟纹取左右对称的鸟形，长长的尾羽与长长的冠羽相交（图三：11）。可以明显地看到鸟形是按“8”形来安排的，并用细小的小钩形作地纹，使对称鸟纹微微凸起（图六：3，图版贰：2）。

鸟纹牛纽“邵之食”鼎^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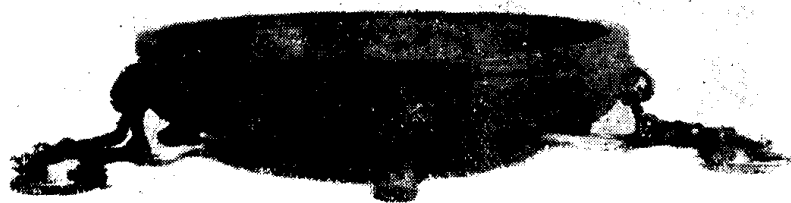
1980年新都马家公社出土。通高25.5、口径24、足高15、腹深11.6厘米。

盖面与腹部各用二层条带式的二方连续图案鸟纹为主体纹饰。鸟纹以双鸟相对排列为一个图案单位（图三：12），以此为骨架构成图案形象的基础。用阴线刻铸成的鸟纹（图三：13），被细小珍珠底纹衬托得更为动人（图六：1）。

虎纹铜盂盖（一）

1951年四川省博物馆收集。盖高3.8、口径2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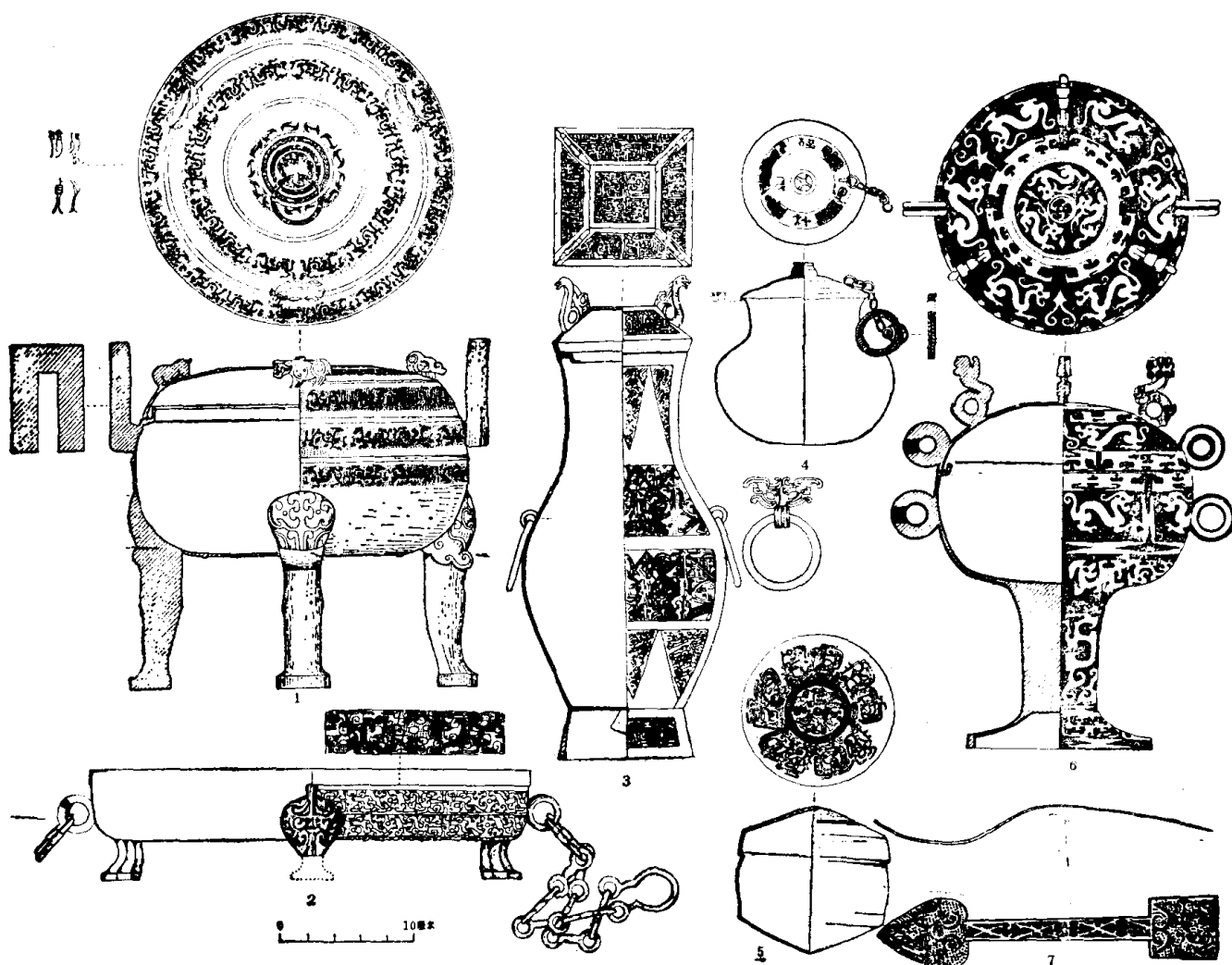
盖面上有两圈兽面纹，内圈较外圈稍微宽一些。在外圈的纹饰中留有一小段空白地，空白处阴刻一组巴蜀图象符号，即铜兵器（剑、矛）中常见的“虎形”。盖心有一个活动的环纽。外圈纹饰等分为七组，内圈等分为四组，各组均为同一形象的兽面纹。多以三角雷纹（图三：14）来刻划图案形



图四 蟠螭纹炉



图五 蟠螭纹
衣形器



图六 1. “邵之食”鼎 2. 蟠螭纹炉 3. 鸟纹铜钁 4. 符号纹盃
5. 蟠螭纹盃形器 6. 镶嵌虎纹豆 7. 鸟纹匕

象，适当配以梯形雷纹（图三：15）。在兽面纹与兽面纹之间，有一个用米点纹刻划的纹饰（图三：16），两圈纹饰都以这个纹样作为等分段。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巴蜀铜器纹饰中运用图案特有的表现手法如同心（即同一个圆心）、同形（即同样的形象）、等距、等分、反复、对称、均齐、平衡……等等，已达到纯熟地步。

虎纹铜盂盖（二）

1952年羊子山172号墓出土。

盖身几乎近于平面形，近盖边沿处有一浮雕兽面衔环。盖上也是用同心、等分图案手法来安排纹饰的。外三圈均以对称虎纹为主，近圆心处一组（即盖的顶面）为同形纹（图三：17），象征一团火。

虎形的图案构成都采取“∞”形，并着重刻划前、后各一只足，为了适应图案纹样的布局，减弱了虎尾的表现，仍不失虎的威猛气概。对于纹饰中的空白处理，处处权衡着图案的虚与实的关系，如虎背和胸前的空白处，用一些小钩纹加以装饰，这样使图案形象左右平衡。从这里又可看到，巴蜀铜器纹饰中的形象，是富有个性特征的（图八：1）。

云纹虎耳盃缶^③

1980年新都马家公社出土。通高29、腹深23.5、底径23.5厘米。

两耳间肩颈部有阴文符号一个（图三：18）。

盖面和腹中部有四至六个凸突的、用小



图七 蟠螭垂叶纹提梁壶

钩点组成的团花图案，与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盥缶相似。

镶嵌虎纹豆

1976年绵竹出土。

通高30、豆径19.5、豆深9厘米。

整个器型以满嵌虎纹著称。原镶嵌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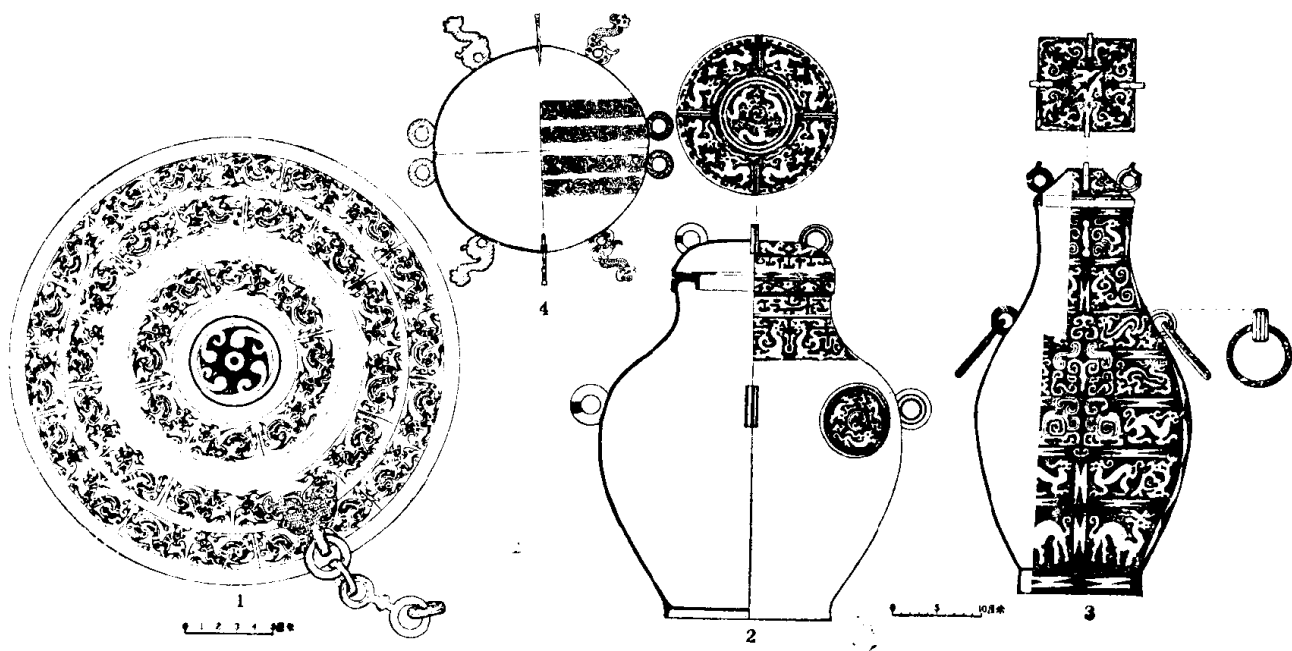
脱落，豆身花纹作凹下的虎形。盖面盖身虎形都以“∞”形为虎形骨架。由于各个装饰部位的形体比例不同，为了使其相统一，虎纹在保持骨架的基本特点上作相应的变化。例如豆盖上的虎纹采用大、小同心的两个圆，盖心一个小圆，盖沿一个大圆，并以三等分划分，这就给虎形找到了安排的位置。小圆中的三个虎纹连续排列；大圆中的虎纹则以两虎对称为一组，共设三组，环绕豆腹一周。这样部分布局的变异，是图案组织法则对立统一的一个生动的实例（图版貳：5，图六：6）。

虎纹铜罍^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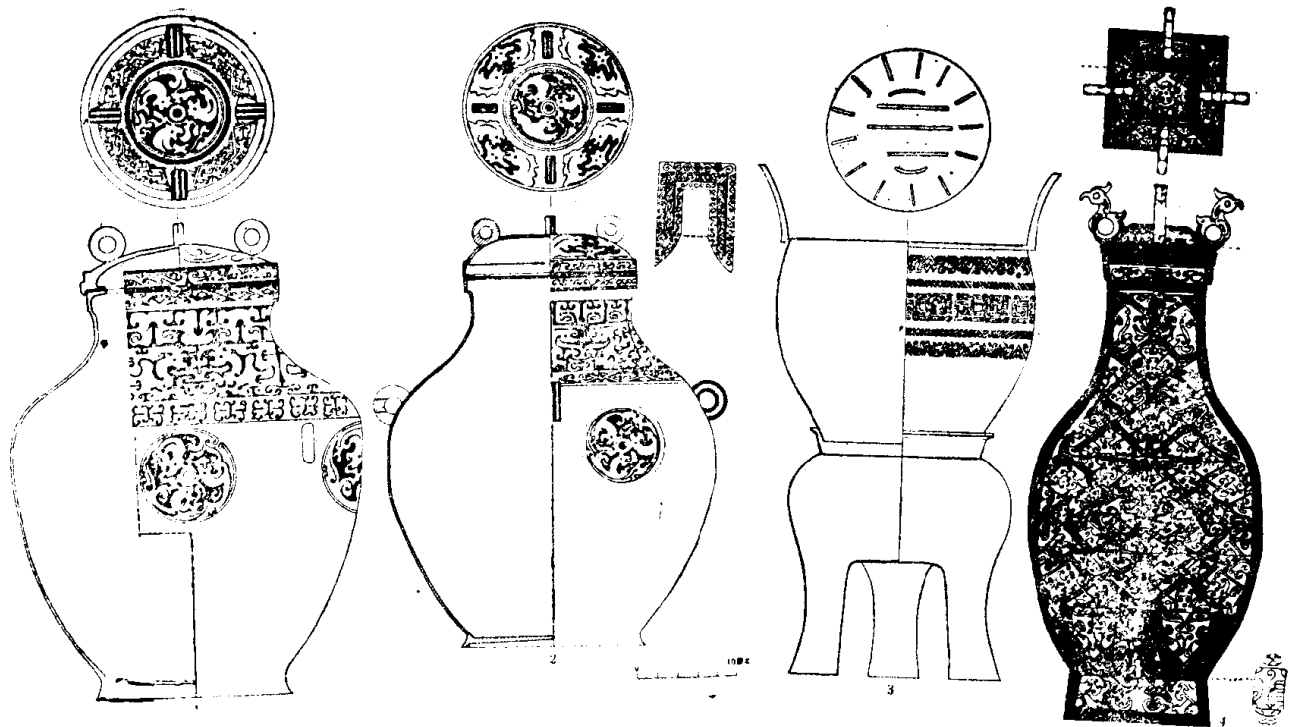
1972年涪陵小田溪出土。

通高48.8、口径19、底径20.4厘米。

纹饰布局有独到之处，以腹部四环耳为水平线，将器型划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包括盖）采取满、密的装饰布局，盖面顶部用同心布局，口沿、颈肩部为二方连续的布局（条带式）。在下部的素地上安排了四个与盖面中心相同的又大又圆、以虎纹组成的圆形图案。这种上密下疏的布局章法



图八 1.虎纹铜罍盖(2) 2.鹿纹罍 3.虎纹缶 4.蟠虺纹铜敦



图九 1.虎纹铜罍 2.虎纹铜罍 3.几何蟠螭纹甗 4.几何云纹铜甗

使腹部四个圆形虎纹特别明显（图版貳：1，图九：1）。

此外，1974年峨嵋符溪出土的另一虎纹铜罍（图九：2）、1976年绵竹出土的鹿纹罍（图八：2），器物造型相似，纹饰相近，只是鹿纹内容不多见。

虎纹钊

1976年绵竹出土。通高50厘米。

此钊并非只有虎纹一组，还有鸟纹（见于颈部、盖面四边）和鹿纹（见于胫部）等。以对称、平行、排满的方式处理多种动物，也很有特色（图八：3）。

几何菱纹甗（图见《文物》1981年第6期14页图三二）

1980年新都马家公社出土。通高50.1、足高13厘米。

耳上有阴刻人字纹。颈腹部施五层条带式几何纹饰。一、五两层都以人字形（图三：19）作连续排列，为了在节奏中有变化，又以水涡纹（图三：20）穿插其中；二、四层是绳纹，它们显然是为了衬托中间一层较宽的主体纹——四方连续的菱形罔纹（图三：

21）。在排列上使它上下左右反复，图案繁而不乱，收到几何纹饰独有的艺术效果。

几何蟠螭纹甗^③

1980年新都马家公社出土。

形制与前器相同，惟立耳稍向外撇，耳上有三条纹饰，中间一条为纹索纹，两边各一条均以“∞”形作连续排列。

图案纹饰同前类似，也以五层几何纹装饰器身，除两条纹索纹相似外，上下两层变异为连续的双“人”字形或单“人”字形排列。在“人”字形中穿插以组合的圆罔形（图三：22），突出中间的以点和双勾刻划的变体蟠螭纹（图九：3）。

勾连垂叶纹鉴（图见《文物》1981年第6期14页图三一）

1980年新都马家公社出土。口径38.1、高21.3、底径24.8厘米。

颈部有带式勾连纹一周联接腹部成六组蕉叶式钩连纹，纹饰繁茂细密，器型庄重。

蟠虺纹铜敦

1976年绵竹出土。通高32、口径24.4、腹深12厘米。



图一〇 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

近口沿处各有一对环纽和二层条带式的蟠虺纹。在盖顶和器底又各有三个鼎立的“S”形扁平浅雕蟠虺，上作纽，下作足(图八:4)。

几何云纹铜钫

1950年新津出土。通高55、口径11.4、底径1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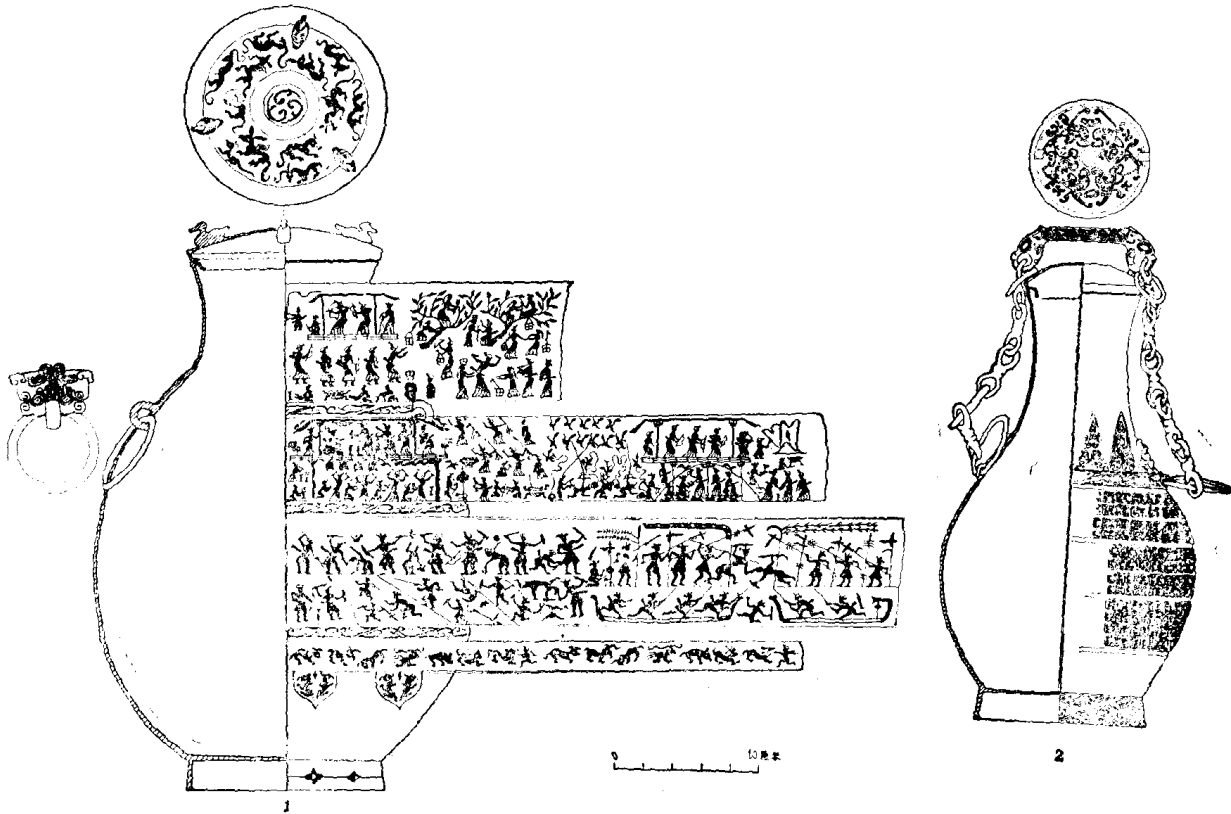
此件比前一件鸟纹铜钫稍大。这件铜钫以云纹(图三:23)组织在斜方格中,左右对称,格式统一。(图九:4)。圈足内有阴文符号(图三:24)。

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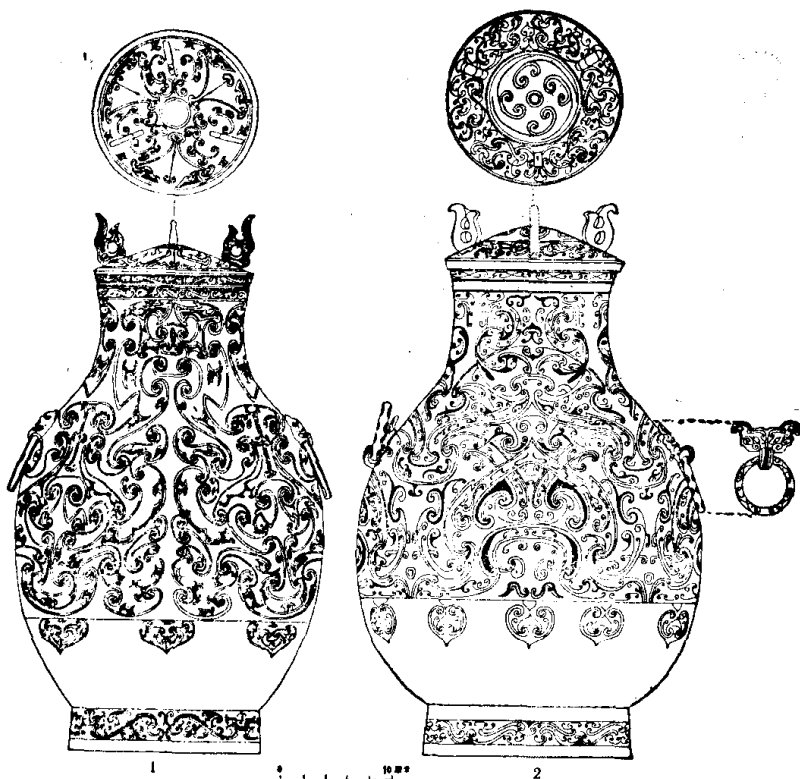
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通高40、口径13.4、腹径26.5、足高2厘米。

以人物为题材内容的纹饰,在巴蜀青铜器上并不多见,像这样连续开展、情节丰富的场面,如宴乐、弋射、狩猎以及水陆攻战等等,就更为少见。

依靠人物动态的装饰性,来取得图案的形式美。从上、中、下三层的纹饰来看,人物不仅动态特征鲜明,而且形象也很美。如第二层宴乐中的击磬奏乐的场面和第三层水陆攻战中的陆战厮杀场面,人物的动态和



图一一 1.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 2.蟠虺纹提梁壶



图一二 1.嵌错漩涡纹铜壶 2.嵌错云水纹铜壶

人物的排列都富有舞蹈化的特点。正是采取这一特殊的处理，使人物的动态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为了情节场面更好的开展，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不作重叠的构图安排，而是运用散点、平视的透视法则，同时选择最易表现人物特征的角度来处理构图，如正面和侧面两个角度。这种构图安排，既把情节场面交待得清清楚楚，又富有图案纹饰的表现特点（图一〇，图一一：1）。

嵌错漩涡纹铜壶

1978年广元出土。通高49、口径14.5、腹宽28、底径17.5厘米。

纹饰以漩涡纹为主题，几乎布满了整个器壁，只是腹胫部留有一带素地，在素地上以等距安排了六个较小的心形漩涡纹。

漩涡纹在整个构图中加强了图案形象的动势美。按照对称、均齐的法则，它们时而穿插，时而回旋，时而密聚，时而散开，时而急直而过，时而缓缓弯曲而来，形成一幅

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图一二：1）。不管怎样变化无穷，还是没有离开我国古代图案的基本形式（图三：25—27）。像这样鲜明地反映中国古代图案的作风和气派，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嵌错云水纹铜壶^⑨

1972年涪陵小田溪出土。通高50、口径15.2、底径19.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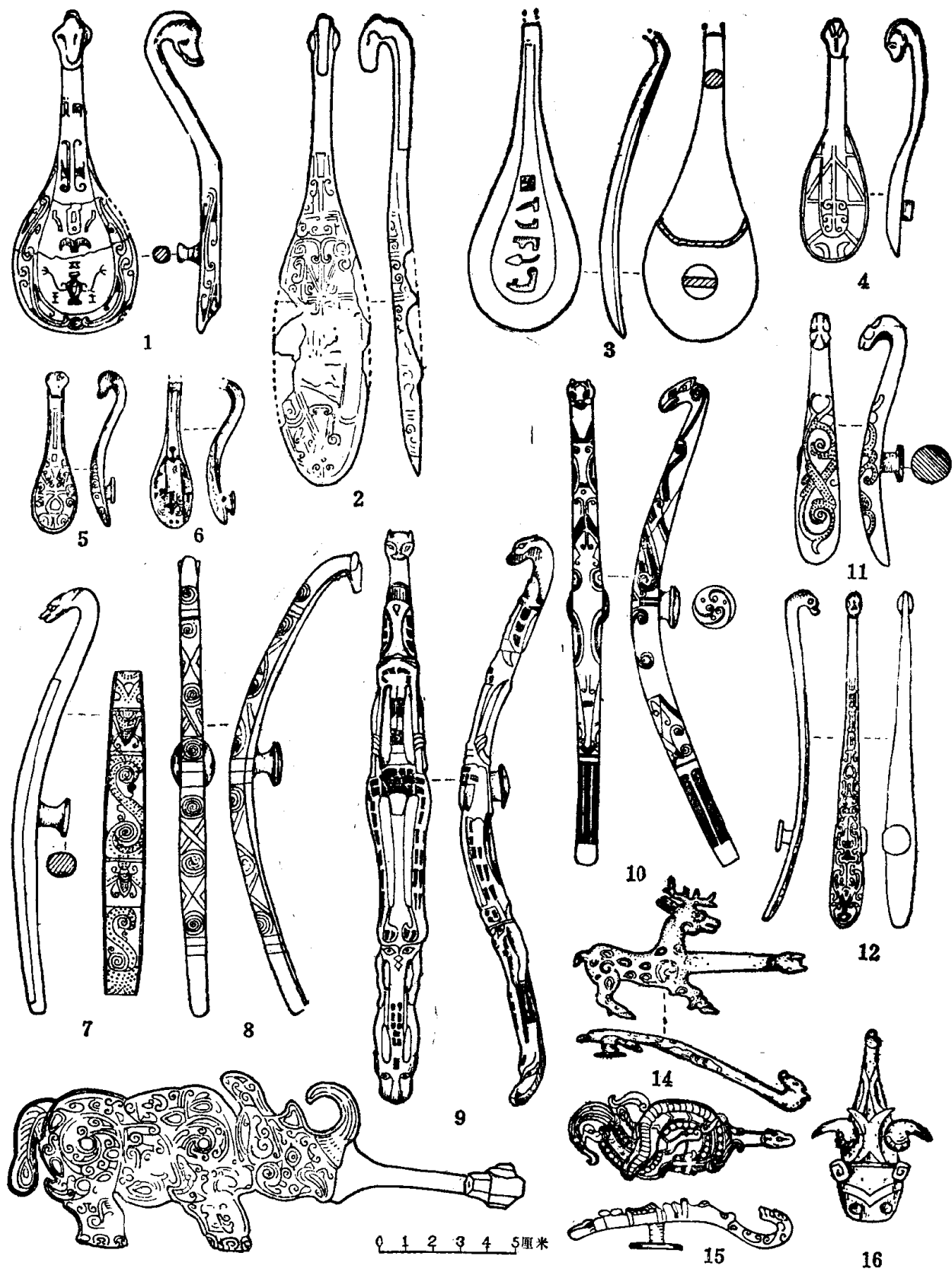
这件铜壶与前一件的造型样式和纹饰布局大同小异。在腹胫部素地带内，是十二个心形云纹图案。此壶以“☉”形的图案为主，因而所刻划的图案形象以及所产生的格调也就显得更加秀丽。

还值得提到的是：这两件铜壶，都以简洁的造型、繁丽的纹饰互相配合，互相衬托，互相加强。因而所取得的艺术效果更加显著（图一二：2）。

蟠螭纹提梁壶

1956年羊子山85号墓收集。高35.5、口径8、底径1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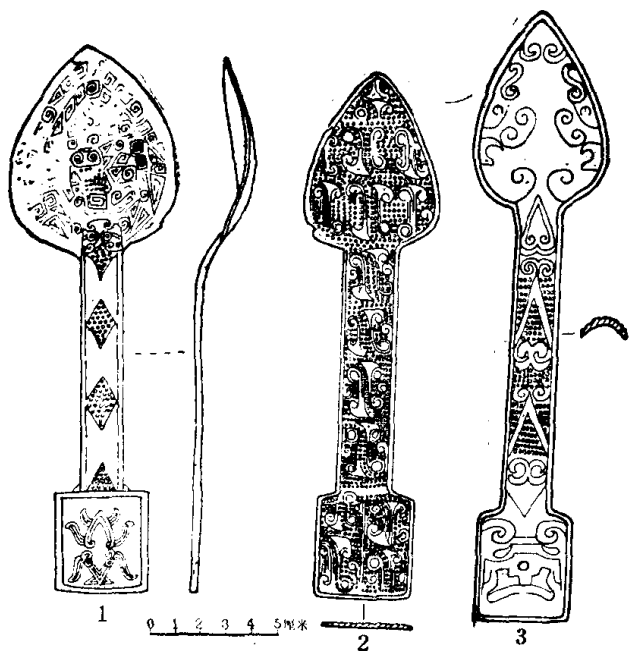
这件铜壶，以肩上铺首衔环为界，将器型装饰划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纹饰简洁。只是盖面和颈与肩相近处，有不同图案格式的双勾变形云纹。下部纹饰繁华。从肩至腹部有四道凹下的弦纹，恰好把腹部分成四个等分。最后一个等分为素地，上面三个等分都有纹饰，以拟蚕纹（图三：28）为主。由上、下、左、右四个小方“音符”构成图案的一个“节拍”（一个单位），运用反复手法，将这些节拍按条带格式排列，每等分中有两条。由六条严密、工整纹饰形成立体纹。通过最后一个等分的素地安排，紧接着在圈足上用线刻装饰了一周斜方格变形云纹，衬托着主体纹（图一一：2）。在装饰上运



图一三 1—6.匙形勺式带钩 7—12.条柱式带钩 13—16.象生式带钩



图一四 1—45. 符号纹印 46—62. 汉字印
(比例均为1/2)



图一五 1. 蝉纹勺 2. 几何纹匕 3. 云纹雷匕

用疏密相间的艺术手法,形成独特的节奏美。

铜带钩

匙形勺式六件(图一三:1—6),条柱式六件(图一三:7—12),象生式四件(图版贰:4,图一三:13—16)。

这些带钩,在巴蜀青铜器中各有风采。它们形制基本一致。一般尺寸不大,最长21.5、最短7.4厘米。

铜印章

符号纹印四十七件(图一四:1—45),汉字印十七件(图一四:46—62)。都是由一个或几个符号合并组成,印纹中多有近似形,并多作阴纹或飞白纹(图三:29、30、31)。印纽有扁圆形鼻纽、扁正方形鼻纽、圆柱形纽、瓦纽、桥纽等。

这些印章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如223号的花蒂纹、246号的蜂纹、248号的鸟纹、253号的星宿纹……等等布局独特,形体优美。

最引人注意的是1980年于新都马家公社出土的一件桥纽铜印,印纹的图象符号很值得研究(见《文物》1981年第6期第4页图六)。

勺和匕

蝉纹勺,1976年绵竹出土(图一五:1)。

几何纹匕,1974年峨嵋符溪出土(图一五:2)。

云雷纹匕,1974年峨嵋符溪出土(图一五:3)。

鸟纹匕,1980年新都马家公社出土(图六:7)。

这些器物按照自身的形状比例,施上各异的纹饰,体现出不同纹饰的个性美。

- ① 《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11期。
 - ②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12期。
 - ③ 《中国古青铜器选》(图版28),文物出版社,1976年。
 - ④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版一四〇)文物出版社,1976年。
 - ⑤ 《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6期。
 - ⑥⑦ 《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3期。
 - ⑧ 《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6期。
 - ⑨ 《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5期。
- 《中国图案作法初探》雷圭元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